

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

黃仁瑄 著

中華書局

辨曰檢於庶苑結是有半滿之說實
微之在國編卷而西至聖曰馬以東造
是起不無不有掩蔽非後師臣即空既
明正道於是書聲書韻每設變而際
星級法詞含微散空際而為製五新

二 同音義卷二

第九條

二 同音義卷二

第九條

之功利不可勝言大矣哉書皇之為
敬也若乃書之異義編諸海藏雜集
由飲尤之心文義宜慶音之口流傳
此七百餘年至於文字或難備傍有
誤者稽之所不載聲韻之所不聞

或傳體辭語或於音臣本不行音
披難究諸欲使坐禪明師立聞精
就學無勞於目及請益聖韻於
衣所以一二百字于邊際與世俗
字古或於花嚴真經 十二卷 初其
一 卷 凡 六 卷 八 卷 十 卷 十 卷 十 卷
一 卷 十 卷 十 卷 十 卷 十 卷 十 卷
故曰無雜文字辭
脫也暨國朝初有沙門玄應撰攝生知
獨運光覺明惠梵異語識空音字
撰切經音義一部凡二十五卷可以
昭諸後進光復先賢作披序之聲染
涉法門之錢餘公有沙門慧苑撰

中華書局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唐五代佛典音義語料庫建設”

(08BYY048)階段性研究成果

華中科技大學自主創新研究基金“漢文古籍中特種文字的計算機處理研究”

(2010JC061)階段性研究成果

“華中科技大學文科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

黃仁瑄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 / 黃仁瑄著.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3

ISBN 978 - 7 - 101 - 07723 - 0

I. 唐… II. 黃… III. ①佛經—訓詁—研究—中國—唐代②佛經—訓詁—研究—中國—五代(907~960)
IV. H131.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數據核字(2010)第 234110 號

-
- 書 名 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
著 者 黃仁瑄
責任編輯 秦淑華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張 22½ 插頁 2 字數 417 千字
- 印 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7723 - 0
定 價 56.00 元
-

序

黃仁瑄博士的《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是在他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擴充修訂而成的。2000年，我與仁瑄商定將《慧琳〈一切經音義〉的計算機處理和音系研究》作為他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課題，說實話，這個課題對於剛邁入學術領域的碩士來說是大了。不說別的，慧琳《一切經音義》約一百二十萬字的文本的數字化處理，僅這個任務工作量就不小，仁瑄能不能很好完成，我心裏還真的有點不踏實。到了2002年，仁瑄如期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並獲得了答辯專家的好評。於是，在確定仁瑄的博士論文課題時，我就放心地提出讓他把研究範圍擴大到玄應、慧苑、可洪和希麟音義等五部唐五代佛典音義。在做選題報告時，參加評審的諸位先生又提出任務繁重，能否完成的質疑，仁瑄聽了自己也有些猶豫。但後來他還是不畏煩難，艱苦奮鬥，終於如期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唐五代佛典音義音系研究》，在2005年通過了答辯，獲得了答辯委員會的高度好評。至今我還記得通過答辯以後，仁瑄一方面為學業有成奮鬥終有回報而高興，一方面又為數年刻苦攻讀備嘗艱辛而感慨唏噓。現在又經過幾年的修訂擴充，撰成此書出版在即，回首這段往事，我當然為仁瑄感到非常高興和欣慰。

佛典音義之學的興起，可以追溯到清代乾嘉之際。在傳統小學中並沒有所謂“音義”，《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序》說：“以《爾雅》以下編為訓詁，《說文》以下編為字書，《廣韻》以下編為韻書。”正式確立了小學文字、音韻、訓詁三分的格局，但訓詁、字書、韻書三類中並沒有收納音義書。例如：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在經部五經總義類，宋孫奭《孟子音義》在經部四書類，唐何超《晉書音義》在史部正史類，唐李籍《九章算術音義》在子部天文算法類，唐潘緯《柳河東集音義》在集部別集類，這幾種書中潘緯音義雜入柳集注中，無專書傳世。可見今日所謂“音義書”散佈在四部之中，無論是隨文附注還是專書別行，學者並不把這些書看作語言學著作。至於佛典音義，就更不為學人所重視。“元應、慧苑之書，世多不傳，南宋人博雅如朱子、王應麟，亦未之見”（清孫星衍《倉頡篇序》）。即使是《四庫全書》，作為當時規模最大的叢書，收書3461種，存目6793種，但

是這五種唐五代佛典音義一部也沒有收錄。

直至乾嘉學者出，這個局面纔改變。肇其端者可能是任大椿，他“參覈典墳，兼及二藏音義”，從玄應《一切經音義》中“鈎沈起滯”，於乾隆四十七年輯得《字林考逸》八卷，開卷第三條“祐者助也”即注明輯自“唐沙門元應《一切經音義》”，此類注文在書中觸目皆是。乾隆四十九年，孫星衍輯成《倉頡篇》二卷，在自序中說：“古書不可不覽。頃禮部儀制司任大椿集《字林》八卷，索之，彌月始獲一見。星衍以戊辰之歲讀書江寧瓦管寺閣，游覽內典，見元應《一切經》並慧苑《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為多，隨加鈔摭，兼采儒書。”“戊辰”是乾隆十三年，孫氏特別申明他始見玄應、慧苑之書的年代，不知道是不是想撇清他是受到了任氏書的啟發，但他“隨加鈔摭，兼采儒書”，比起任大椿“參覈典墳，兼及二藏音義”，遣詞用語間透露出學者對待佛典音義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他認為：“元應、慧苑之書……中引古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於世！”並且“揄揚其實，屬友刊行之”。

後來莊炘見到任、孫二氏之書，注意到這兩本著作與佛典音義的關係，在乾隆五十一年校刻刊行了玄應《一切經音義》。他在序中說：“（玄應音義）今在釋藏中，自唐以來，傳注、類書未及引，通人碩儒亦未及覽，閱千餘年而吾友任禮部大椿著《字林考逸》，孫明經星衍集《倉頡篇》，始見此書，成其撰述，予閱而美之。頃宰咸寧，至大興善寺，見轉輪釋藏，求其卷帙，善本猶存，乃施金五百，刊而行之。”細玩序文，此書刊佈與孫星衍頗有干係，孫氏還與錢坫合力參與校正，所以孫星衍“屬友刊行”的這個友人應該就是莊炘。

不久，嘉慶四年臧庸《拜經堂叢書》又據釋藏本校刻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二卷，並撰《序錄》一卷，盛贊慧苑音義曰：“引漢魏古籍尚夥，亦可以見此書之足貴矣！此定當與《一切經音義》並傳。”莊刻玄應音義和臧刻慧苑音義在佛藏之外提供了所謂“儒本”，得為學界廣泛利用，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據之正訛補闕，獲益良多。

嘉慶七年，謝啟昆不滿朱彝尊《經義考》於小學一門僅錄《爾雅》二卷，乃與陳鱣、胡虔合力撰成《小學考》五十卷，在訓詁、文字、聲韻之外另立音義一類，廣泛搜羅著錄音義書，卷五十中就有元應《一切經音義》、慧苑《華嚴經音義》、可洪《藏經音義隨函》、無名氏《大藏經音》、無名氏《唐藏經音義》、處觀《大藏音》等幾種佛典音義書。謝氏在“欽定”四庫總目門類上別立“音義”，不能不說是頗具膽識，其書承《經義考》為輯錄體，“篇題之下，香豳叙跋，目錄之外，采證群書”（清孫詒讓《溫州經籍志·叙例》），無疑拓展了小學家們的視野。

十數年間，任大椿、孫星衍首開風氣獨具慧眼，莊炘、臧庸校正刊行沽漑後學，段玉裁、阮元援據治學垂範士林，謝啟昆創置部類指示門徑，群賢共襄盛世學術，極大推動了佛典音義的研究。

下逮光緒年間，楊守敬隨使日本，訪得獅谷白蓮寺本慧琳《一切經音義》和希麟《續一切經音義》，二書失傳千年重歸故國，實為學林之幸事。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中說：“余初至日本，有島田蕃根者持以來贈，展閱之，知非元應書，驚喜無似。……佚文秘籍，不可勝紀。誠小學之淵藪，藝林之鴻寶。此書出，遂覺段茂堂（玉裁）、王懷祖（念孫）、任子田（大椿）、沈匏盧（澹）諸先生之撰述，皆有不全不備之憾。”1912年，頻伽精舍印行二書，今人纔可能獲此五種佛典音義之全帙，對唐五代文化展開全面而系統的學術研究，至20世紀末葉，有關佛典音義書的研究逐漸興盛，終成熱潮，涌現出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論著，仁瑄的《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就是其中的重要成果。我們在為新時代學者的貢獻感到驕傲的同時，回顧佛典音義研究的發展歷程，應該對乾嘉諸老心存感恩之情。

謝啟昆《小學考·序》云：“首恭錄敕撰；次訓詁，《經義考》爾雅而推廣於《方言》《通俗文》之屬也；次文字，則《史篇》《說文》之屬也；次聲韻，則《聲類》《韻集》之屬也；次音義，則訓讀經史百氏之書。訓詁、文字、聲韻者，體也；音義者，用也。體用具而後小學全焉。”敕撰涉及到意識形態，姑且不論，謝氏所謂“體”和“用”，按現在的話來說意思是：訓詁、文字、聲韻是通論，各偏重於漢語的詞彙、文字、語音；音義是專論，全面反映專書或群書的語音、詞彙、文字的方方面面。仁瑄的這本書充分體現了音義書的這種性質，討論的範圍包括文獻學、音韻學、訓詁學和文字學，各個方面都有貢獻，其綜合性在同類著作中頗具特色。下面文獻學、文字學各舉一例加以說明，音韻學和訓詁學是書的主體，我就不囉嗦了。

關於慧琳的卒年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元和十二年說，源於唐景審《一切經音義·序》“元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絕筆於西明寺”；另一種意見是元和十五年說，根據是宋贊寧《宋高僧傳·唐京師西明寺慧琳傳》“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仁瑄以為《宋高僧傳》的記載較為可信，因為古籍中“五”往往由於形近致訛誤作“二”。景審序言《慧琳音義》“至元和二祀方就”，《宋高僧傳》則云“迄元和五載絕筆”，“二”“五”互易，正與慧琳卒年的情況平行。但如果僅止於此，那祇能說明“二”“五”相淆，不能遽判孰對孰錯，可能是“五”誤為“二”，也可能是“二”訛作“五”，甚至可能兩個字都是錯字，例如可能應該是“三”，景審誤作“二”，贊寧誤作“五”。仁瑄進一步指出古時以干支紀年，往往可作為人

們考訂時間的依據,《宋高僧傳》所言“庚子”恰是元和十五年,這是一條可靠的證據,因為元和十二年是丁酉年,“二”可能訛作“五”,但是“丁酉”幾乎不可能誤為“庚子”。如果没有新的材料,仁瑄此說可成定讞。

在文字學方面,仁瑄關於轉注的討論也引人注目。轉注,是文字學中的一個老大難問題。許慎在《說文解字·叙》中說:“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但書中再也沒有指明哪一個字屬轉注,這個定義和“考、老”之間的關係,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釋,以致聚訟千年,至今仍新見迭出,各種意見祇能說是後人的設想,很難說是否符合許慎的原意。1992年,孫雍長先生出版了《轉注論》,提出了轉注是將一個假借字作為“轉注原體字”而“加注意符”的造字法,產生了廣泛影響。這個意見的出現有其學術背景,與六書之形聲的研究的發展相依共生。

清末劉師培在《小學發微補》中說:“如‘侖’字,本係靜詞,隱含分析條理之義。上古之時,祇有‘侖’字,就言語而言,則加‘言’而作‘論’;就人事而言,則加‘人’而作‘倫’;就絲而言,則加‘絲’而作‘綸’;就車而言,則加‘車’而作‘輪’;就水而言,則加‘水’而作‘淪’(皆含文理成章之義)。是‘論倫’等字皆係名詞,實由‘侖’字之義引申也。‘堯’字亦係靜詞,隱含崇高延長之義。上古之時,祇有‘堯’字,就舉足而言,則加‘走’而作‘趨’;就頭額而言,則加‘頁’而作‘頰’;就山而言,則加‘山’而作‘嶢’;就石而言,則加‘石’而作‘磽’;就馬而言,則加‘馬’而作‘驍’(高馬也);就犬而言,則加‘犬’而作‘獠’(高犬也);就鳥羽而言,則加‘羽’而作‘翹’(長尾也)。是‘嶢磽’等字皆係名詞,實由‘堯’字之義引申也(又如從‘台’之字皆有始字之義,草之初生者為‘苔’,人之初成者曰‘胎’,是也。從‘少’之字皆有不多之義,言之少者曰‘眇’,目之缺一者曰‘眇’,禾之少者曰‘秒’,是也。從‘亥’之字皆有極字之義,果之盡處曰‘核’,地之盡處曰‘咳’,是也)。舉此數端,足證造字之初先有右旁之聲,後有左旁之形。聲起於義,故右旁之聲既同,則義象必同。……及事物浩繁,乃以右旁之聲為綱,而增益左旁之形。”

前人多以為形聲字是先“以事為名”取意符,再“取譬相成”加聲符,劉氏一反成說,振聾發聵,可以看到宋人右文說之影響。右文說發現聲符可以反映形聲字的語義,清王筠《說文釋例·分別文累增字》又從六書造字法的角度涉及到聲符和形聲字的關係,到了20世紀下半葉,劉又辛先生發表《從漢字演變的歷史看文字改革》(《中國語文》1957年第5期)和《“右文說”說》(《語言研究》1982年第1期),利用古文字的材料,從漢字歷史演變的角度,進一步指出早期

形聲字是在假借字上增加意符而形成的，比劉師培的討論更加深入系統而富有理論色彩。這時，孫雍長先生的轉注論就呼之欲出了。

但是，這些看法仍然還祇是後人研究所得，以今論古，雖不乏真知灼見，卻不能提供更多的可靠的古文獻證明。仁瑄在做碩士學位論文的時候，一次告訴我，他在慧琳《一切經音義》中發現了很多有關轉注的材料，我看了以後，認為這是一個十分有價值的發現；是現在能見到的文獻中最早的對轉注字的成批標注，經過初步觀察，覺得可以作為孫雍長先生的轉注論的有力支持，也符合劉又辛先生對漢字發展途徑的論斷。

根據景審序言，慧琳音義引證浩繁，所音取則於元庭堅《韻英》及張戢《考聲切韻》，釋義依《玉篇》《說文》《字林》《字統》《古今正字》《文字典說》《開元文字音義》七家字書，“七書不該，百氏咸討”，所述皆有憑據，因此慧琳指明轉注應該不是憑私臆說，當有所本，可以採信。所以我鼓勵仁瑄就這些材料進行深入研究。仁瑄後來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對慧琳《一切經音義》中的這批轉注字材料從各個方面展開了討論，最終形成了本書術語研究中轉注一節，提出轉注是在轉注原語的基礎上加注意符的造字方式，在轉注過程中，轉注原體字不必事實存在，但在人們的言語中，一定得有和轉注字意義相關的言語事實——轉注原語。轉注原語表現在漢字形體結構中，就是通常所謂的表義聲符，從而對孫雍長先生的觀點進行了補充修正，並提供了文獻證據。

後來我纔知道早在 1992 年解冰先生就在《慧琳〈一切經音義〉轉注、假借考》（《貴州大學學報》第 2 期）一文中已經討論過慧琳音義中的這批轉注字，但解冰先生關注的是六書四體二用的問題，認為這批材料反映慧琳已經有了轉注、假借為“字之用”的意識。上面我說的轉注的研究歷程好像是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那是從學術史角度的表述，各位研究者很可能是“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特別是在信息不發達的前網絡時代，這種情況更是屢見不鮮。同樣，關於慧琳音義中轉注材料的首次發現，應該是解冰先生，但這不妨礙仁瑄也是獨立發現這些材料的，兩位都在慧琳音義和轉注的研究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音義書有各種不同的分類，其中一種是從傳統三教的角度，分成儒學音義、道書音義和佛典音義，道書音義和儒學音義性質基本相同，佛典音義獨具特色。漢文佛經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產物，佛典音義就會涉及到漢語和梵語兩種語言。終南太一山釋氏《玄應一切經音義·序》：“隨音徵引，並顯唐梵方言。”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序》：“音訓梵言，聊為注述。”景審《慧琳一切經音義·序》：“印度聲明之妙，支那音韻之精，既瓶受於先師，亦泉瀉於後學。”希麟

《續一切經音義·序》：“唐梵對翻，古今同異，雖依憑據，更俟來英。”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前序》：“或有將雙譯對會，諱以施行；或有諸藏勘同，詳之取定。”說的就是佛典音義的這種特殊性質。這些話既是對佛典音義作者的贊許，也可以看作是對今天研究者的學術素養的要求。

研究佛典音義，如果就像對待儒學音義和道書音義那樣去討論，可以做得深入而系統，但不免沒有充分利用佛典音義的特殊學術價值，會遺漏很多有價值的學術信息。仁瑄的書在這方面應該說是做得比較好的，特別是在利用梵漢對音研究唐五代漢語語音系統上。

音韻學的研究任務包括音類的歸納和音值的構擬。早在乾嘉之時清儒就開始了對漢語古音音值的探索，例如戴震《聲韻考》《聲類表》的古韻九類二十五部，每部都採用影母字命名，就反映了戴氏心目中的上古韻部讀音，但是因為時代的限制，他們沒有找到合適的材料和科學的方法，這種工作祇能說是一種猜測。

到了上個世紀初，高本漢使用歷史比較法進行漢語古音的構擬；汪榮寶發表《歌戈魚虞模古讀考》，使用譯音對勘法探討古韻音值，兩種音值研究方法同時引入我國，也都各自引發了古音學上的一場大辯論，但此後的發展很不相同，前者成果豐碩，後者少人問津。這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我曾經聽到過有學者說既有歷史比較法，就不必再用譯音對勘法，這是第一個原因。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同一課題可以而且應該進行反覆但不是重復的研究，任何使用不同的材料、運用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的學術討論都是有益的。

我曾經在《對音還原法發凡》（《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一文中討論過歷史比較法和譯音對勘法的不同性質，指出歷史比較法是利用有親屬關係的現代語言或方言進行的逆向比較，語料是具有發生學關係的同源詞，研究者認為語音形式存在差異但有嚴整對應關係的詞，優於語音形式相似的詞，語音相同或相似的借詞應該剔除，構擬的古音是一種可能的音值，它必須能解釋古代漢語文獻所反映的所有有關的音韻行為，同時還要能解釋從構擬的古音到現代語言或方言的演變，構擬的可靠性在於其解釋力，能解釋的語言現象越豐富，可靠性就越大，學者研究時追求的是儘量逼近實際的讀音；譯音對勘法是利用古代漢字和外族拼音文字的對音進行的橫向對比，借詞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材料，語料之間是共時異源的關係，即使是有親屬關係的語言，研究者也只關注它們之間的接觸和移借，並不管它們有沒有發生學上的同源關係，考訂出的古音應該是當時漢語的實際讀音，祇是因為兩種語言間語音系統的差異，不免會丟

失若干語音信息，造成一些誤差，學者研究時追求的是儘量不偏離實際的讀音，因此我們認為把這種方法稱作對音還原法，更能反映它不同於歷史比較法的性質。所以，歷史比較法和對音還原法的研究可以互相參證，各有其學術價值，都應該提倡。

另一個原因是從事譯音對勘的研究，需要特別的專業知識和專門的學術素養，不免阻礙了更多的學者。仁瑄此書利用梵漢對音對玄應、慧苑、慧琳、可洪、希麟五種音義書反映的語音系統進行了討論，為佛典音義的研究，也為對音還原法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是值得重視的。

玄應、慧苑、慧琳、可洪、希麟五種佛典音義書，最早的玄應音義約成於唐德宗龍朔初年(661~663)，最晚的希麟《續音義》約成於遼聖宗統和五年(987)，跨三個多世紀，是研究唐五代漢語發展史的好材料。仁瑄的書不僅對五種佛典音義書的語音系統分別作了共時描寫，還將五種書貫穿起來對漢語語音演變進行了歷時研究，並對唐五代漢語語音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點綫結合、縱橫兼顧，這是一種很好的研究模式。

我在1996年曾經主持過“隋唐五代漢語語音史研究”的課題，當時確定了幾個原則：第一是必須使用同一種性質的語料，同質異構比較才有意義，異質異構的比較，既有語音系統的差異，又有語料性質的不同，會給研究工作造成干擾。可供研究隋唐五代漢語語音系統的材料很多，我們祇用韻文，以保證語料的同質化。第二個原則是先共時描寫，在共時描寫的基礎上再歷時比較，所以我們從五代開始往上到隋初唐逆向進行，以免順向工作前面的結論會給後面的研究造成暗示和影響。第三個原則是共時描寫必須自己做，不能用別人的東西。有些個別的例外的語言現象，從共時的角度看是不重要的，從歷時的角度看卻是演變的濫觴或殘存，是構造發展規律的重要事實。由於學術背景、研究目的和觀察角度的不同，研究者對這些現象可能視而不見或棄而不用，而自己親手做，就可以通盤觀察，前後關照，系統處理。第四個原則是先比較再分期，不能先有分期再選定實例進行描寫和比較。

仁瑄的課題設計和研究計劃跟我早年訂的這些原則相合，他提出的唐五代佛典音義音系的分期，跟我研究隋唐五代詩文用韻的分期意見也相合，分成隋初唐、盛中唐和晚唐五代三個時期，隋初唐合於《切韻》，盛中唐開始演變，晚唐五代繼續發展。仁瑄入華中科技大學時，我的課題已經結束，他並不瞭解課題的具體內容，我那篇討論分期的文章《隋唐五代漢語詩文韻部史分期簡論》，是2002年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今年纔公開發表，他纔得以看到並在書中

引用。我用絲聯繩引法歸納詩文用韻，仁瑄用對音還原法研究聲母音值，二人分別獨立工作，得到的結論卻可以互相印證，也是人生治學一大樂事，也使我覺得我們的研究結論是值得研究者參考的。

仁瑄此書還有一個特色，即利用計算機技術輔助進行研究。我要求學生寫論文時首先要將材料數字化，然後建成數據庫，編寫程序處理數據，人機互動進行研究。仁瑄此書論及佛典音義對於“古文”研究的意義，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玄應音義“古文”材料 904 例，慧苑音義 4 例，慧琳音義 1316 例，可洪音義 114 例，希麟音義 88 例；論及佛典音義對於六書研究的意義，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慧琳音義標識“象形”315 例，標識“會意”312 例，標識“形聲”586 例，標識“轉注”47 例，標識“假借”71 例；論及佛典音義引書，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玄應音義引書凡 241 種（篇），其中內典 74 種，約佔所引書總數的 30.7%；慧苑音義引書凡 121 種（篇），其中內典 14 種，約佔所引書總數的 11.6%；慧琳音義引書凡 425 種（篇），其中內典 96 種，約佔所引書總數的 22.6%；可洪音義引書凡 502 種（篇），其中內典 357 種，約佔所引書總數的 71.1%；希麟音義引書凡 172 種（篇），其中內典 15 種，約佔所引書總數的 8.7%。讀者閱讀時，自會留下深刻印象。

沒有數字化技術，短短數年的時間，這樣的工作幾乎不可能完成。這些定量研究為定性研究提供了支持，看似簡單的數字統計，反映出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為課題奠定了堅實而科學的基礎。但有時我會聽到有人說按一下鍵盤就出來結果不是學問，既然計算機做出來跟人做的一樣，為甚麼要用計算機做？我倒覺得既然計算機做出來跟人做的一樣，而且可以做得更好，為甚麼不用計算機做？計算機輔助研究，是學術研究的嶄新形態。

我讀書時多次聽師輩們說，他們曾見前輩能舉一字即知在《說文》《廣韻》何卷何葉，我聽了馬上想起李清照飯餘烹茶與丈夫的智力遊戲：“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自己十分仰慕。這是最早的治學形態，知識儲存在人腦和圖書中，處理全憑自己的大腦。《說郛》卷十六下引宋楊億《談苑》曰：“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採集其事類投餅，倒取之，鈔錄成書。”白居易利用外部載體處理知識，檢索文獻，分析文本，採集數據，鈔錄卡片，分類排次，匯聚生成新的文獻，是一種新的治學形態。但是據宋韓駒《白孔六帖序》記載：“唐白居易攬摭諸書，事提其要，區分匯聚，有益於世。或謂白公文采道德自足以托不朽，顧為此何歟？”看來新的研究方法是很難馬上被人接受的，但經過千年磨合，最終

這種令人齒冷的鈔胥賤役倒成了治學的常規形態。

現在計算機輔助研究是學術研究形態的又一次重大革命，知識不僅儲存在人腦和圖書中，而且儲存在硬盤、磁帶、光盤、U 盤等磁性材料中，人眼再也看不見，知識的處理不僅可以在紙張上用筆書寫文字，而且可以在電腦之內用程序處理數碼，人手再也摸不着，而且不用千年磨合，坐擁書城搦翰疾書的學者不經意間似乎變成了敲敲鍵盤的操作員，看不見摸不着的工作過程更讓人覺得不能控制，無法瞭解，放心不下，當然會出現種種非議。祇要想想當年白居易遭到的白眼，就可以知道這是治學形態轉型時的正常現象，而計算機輔助研究也必將成為學術研究的常規形態。至於說按一下鍵盤就會出來結果，那完全是一種誤解，學者利用計算機輔助進行學術研究決不是簡單的技术操作。

我近年發表過幾篇文章探討計算機輔助學術研究的理論、內容、材料和方法，指出所謂計算機輔助研究實質上是將人腦儲存處理知識的過程數字化由計算機完成，首先要揭示釐清大腦密封隱藏的功能，將學科研究方法切分到再也不能分解的最小步驟，考慮到一切可能及其處理方案，排列成符合邏輯的流程，使用計算機語言編寫代碼，計算機執行完後再分析運算結果，發現了問題，重復以上過程，人機互動，直至完成研究。所以，計算機輔助學術研究是一種勞動密集型工作，其強度比傳統紙本工作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又是知識密集型工作，不僅需要學科本體的專業知識，而且需要心理學、邏輯學、數學和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的知識。特別是漢語史研究是傳統學術中最繁難的部分，如何利用計算機輔助進行研究，沒有現成的模式，缺乏成熟的經驗，仁瑄在這方面進行了艱苦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可供借鑒，應該充分肯定。

因為和仁瑄有一層師生關係，恐怕難免有溢美之辭，所以本文並沒有對他的書作出很多具體的評價，祇是從個人所見，就如何閱讀這本書提出幾個可以注意的視角。任何學術著作都有局限，都有缺點和錯誤，讀者自能鑒別，如能不吝指正，我想仁瑄應該是非常歡迎和高興的。

尉遲治平

2010年10月於武昌瑜伽山麓行吟澤畔

目 錄

序(尉遲治平)	1
第一章 緒論	1
1.1 佛典音義	1
1.2 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概況	16
第二章 唐五代佛典音義概述	30
2.1 玄應和玄應音義	30
2.2 慧苑和慧苑音義	40
2.3 慧琳和慧琳音義	46
2.4 可洪和可洪音義	65
2.5 希麟和希麟音義	78
第三章 唐五代佛典音義的體例和價值	82
3.1 佛典音義的體例	82
3.2 佛典音義的價值	99
第四章 唐五代佛典音義術語研究	113
4.1 關於“轉注”	113
4.2 關於“借音”	130
4.3 關於“楚夏”	138
4.4 關於梵漢對音的標記	147

第五章 唐五代佛典音義引書研究	153
5.1 唐五代佛典音義引《文選》研究	153
5.2 慧苑音義引《說文》研究	187
5.3 可洪音義引《大藏經》研究	222
第六章 唐五代佛典音義音系研究(上)	235
6.1 梵漢對音和唐五代漢語音韻研究	235
6.2 佛典音義和梵漢對音	242
第七章 唐五代佛典音義音系研究(中)	255
7.1 玄應音系聲母的梵漢對音及其系統	255
7.2 慧苑音系聲母的梵漢對音及其系統	271
7.3 慧琳音系聲母的梵漢對音及其系統	277
7.4 可洪音系聲母的梵漢對音及其系統	294
7.5 希麟音系聲母的梵漢對音及其系統	314
第八章 唐五代佛典音義音系研究(下)	322
8.1 唐五代佛典音義音系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	322
8.2 唐五代佛典音義音系的分期	326
參考文獻	328
後記	343

第一章 緒論

音義是辨音釋義的傳統語言學著作^①。根據外典、內典的不同^②，音義書大略有儒典音義和佛典音義兩類^③。儒典音義的編纂始於漢代，發達於魏晉之際，有隋以後沒落^④；佛典音義的編纂則肇始於魏晉末葉^⑤，唐五代時蔚為一時之風，有宋以後沒落。兩類音義有同有異，次第形成中國辭書編纂史上兩道絢麗的風景，各領風騷數百年。

1.1 佛典音義

佛典音義是音義的又一次大發展。中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卷不僅是佛典音義的集大成之作，而且是音義類著述的巔峰之作。

①周祖謨：“音義書專指解釋字的讀音和意義的書。古人為通讀某一部書而摘舉其中的單字或單詞而注出其讀音和字義，這是中國古書中特有的一種體制。根據記載，漢魏之際就有了這種書。魏孫炎曾作《爾雅音義》是其例。自晉宋以後作音義的就多起來了。一部書因師承不同，可以有幾家為之作音，或兼釋義。有的還照顧到字的正誤。這種書在傳統小學著作中獨成一類，與字書、韻書、訓詁書體例不同，所以一般稱為‘音義書’，或稱‘書音’。”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頁452。

②釋子稱佛門外著作為外典，稱佛門內著作為內典。

③還有道典音義一類。道典音義在唐玄宗朝極盛，旋趨衰微，元末以前已難見其蹤跡（參見汪業全）。道典音義在音義史上幾乎沒有產生什麼顯著影響，故不論。

④黃坤堯（1997：5～15）對全部儒典音義著作做過比較詳細的梳理工作。

⑤據唐釋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皇朝傳譯佛經錄第十八》“大唐衆經音義一部十五卷”下文字（詳後），最早的佛典音義著作當屬北齊釋道慧所撰之《一切經音》，則至遲在北齊時期就開始了佛典音義的編纂。

1.1.1 佛典音義的編纂

漢文大藏經中有許多音義類著作^①。它們主要對佛經典籍中難讀、難解的字、詞注音釋義，間亦兼及校勘。佛典音義的產生有時代(外因)和宗教(內因)兩方面的原因。

1.1.1.1 佛典音義編纂的時代因素

佛教在兩漢之際由印度主要經西域傳入中國，經過漢、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發展，隋唐時臻於全盛。根據下表所示，隋唐時僧侶和寺廟的數量可見其興盛之一斑(湯用彤 1982:52)：

帝代	僧數	寺數	附注
隋朝	236200	3685	據《法苑珠林》卷一百。
唐太宗		3716	寺數據《續高僧傳》卷五。僧數據道宣云不滿七萬，上詳。
唐高宗	60000 餘	4000	據《法苑珠林》卷一百。
唐玄宗	僧 75524 尼 50576	5358	據《新唐書·百官志》，應系玄宗時數。《唐六典》所舉寺數即為 5358，可證。
唐武宗	260500	大寺 4600 蘭若 40000	此據《舊唐書》檢毀之數。

不僅如此，其時寺院經濟亦空前發達(牟鐘鑒:483)，各大宗派如三論宗、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禪宗、淨土宗、真言宗、三階教等相繼創立。佛教的盛行，對當時的社會政治、學術思想和文化生活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1.1.2 佛典音義編纂的宗教因素

佛教的興盛，直接開啟並推動了中國的佛經翻譯事業。在漢魏以來佛教學者長期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積累的基礎上，譯經事業唐時已經臻於完備。據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記載，經、律、論三藏已共列 1076 部 5048 卷，與再刻高麗藏 1521 部 6589 卷相比較，已經超過其總數的三分之二。佛典浩瀚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由於宗教、翻譯和鈔寫等原因，佛經內容特別是一些宗教術語深奧難

^① 呂澂《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撰述”類下立“音義部(悉曇法數等附)十九部二百九十五卷”(頁 150)。

測，許多音譯詞前所未聞，文字的錯漏更是所在皆有^①。為減輕研習佛經的困難，僧人們往往隨經文注音釋義^②，積久而成了一種自覺的行為，最終促生了專門的音義著作。

1.1.2 佛典音義著作

在內外因的綜合作用下，佛典音義的編纂蔚為一時之風。始北齊，迄於清，佛典音義的編纂持續了一千六百餘年，涌現了大量的音義著作。

1.1.2.1 魏晉～隋

(一) 北齊釋道慧《一切經音》

現有資料證明，最早的佛典音義著作當屬北齊釋道慧所撰之《一切經音》。釋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皇朝傳譯佛經錄第十八》“大唐衆經音義一部十五卷”下：

昔高齊沙門釋道慧為《一切經音》，不顯名目，但明字類。乃至臨機，搜訪多惑。(T55n2149-p680b24-b25^③)

這是我們見到的最早記錄道慧書的材料。較早提及道慧書及其體例的材料還有如下兩則：

釋道宣《大唐衆經音義·序》：

自前代所出經論諸音，依字直反，曾無追顧，致失教義，寔迷匡俗。(32p0001B^④)

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八《總括群經錄》上之八：

昔高齊沙門釋道慧為《一切經音》，依字直反，曾無追顧，致失教義，寔迷匡俗。(T55n2154-p0562a26-a28)

“前代所出經論諸音”當然包括道慧書。《開元釋教錄》沿用了釋道宣的評價。道慧書今已亡佚，日本學者高田時雄(頁387)認為“其體例當非如通常之

① 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序》：“至如徯徊誤為遲迴，彷徨乃成稽返，俾倪代乎辭塊，軼環遂作女牆，橋書矯形，正斜翻覆，幹存榦軀，樹木參差。”(59p0481a-0481b。p前數字指中華書局《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冊數，p後數字指頁碼，a、b、c分別表示上、中、下欄。下同)參見許端容(1989:1~3)。

② 磧沙藏大部分經卷之末都有音義。參見黃耀堃(頁250~273)。

③ 括弧中數字分別指《大正新修大藏經》(CBETA電子佛典版)的冊數、經卷數、頁碼和行數，其中字母a、b、c分別表示上、中、下欄。下同。

④ p前數字指《高麗大藏經》的冊數，p後數字指頁碼，A、B、C分別表示上、中、下欄。下同。